

唐詩人行年考

譚 优 学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K825.6/59

# 唐诗人行年考

谭优学 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27175

---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---



827175

**唐诗人行年考**

**谭优学**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0.25 字数218千

1981年7月第一版

1981年7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700册

书号：11118·51

定价：1.05元



## 前 言

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，对一个作家“若有取舍，即非全人；稍加抑扬，更离真实”。那意思是要求对一个作家及其作品，要有历史的全面的了解，从那儿发出来的议论，才比较符合实际。一般采用的办法，就是给他作个年谱，尽可能将他的作品加以系年。知人论世，是必须如此的。但要作到这一点，确有许多实际困难。材料不足，就是最通常的一种。但通过大家不断的努力，各以其所得，不管多少和正确错误，拿出来交流讨论，相互辩难，取长补短，“前修未密，后出转精”，时间久了，积累多了，总可以把问题弄清楚，获得基本一致的看法。那么，这个作家的全貌，我们就掌握了。有了这样牢固的基础，谈起来就不至于出现“郢说燕说”的情况。比如唐诗大家李白、杜甫，经过前人今人的研究，李、杜的生平基本上算是搞清楚了。从而论他的作品就八九不离十。至于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理解，容有不同看法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
李、杜当然算唐诗大家，首先把他们的生平搞清楚，那是完全必要的。但一花独放，不可能是春色满园。必须百花兢艳，才能装点出一片锦绣园林，教人沉醉东风。唐代诗歌创作最为繁荣，作家成群涌现，如群星灿烂。风格流派也多种多样。他们当中有不少人，现存作品并不多，一、二百首，三、四十首，甚至

几首。就数量说，少得很，远不能与李、杜相比，但质量却不低，往往是最为传诵的名篇，不朽的杰作。那些篇章其影响不在李、杜作品之下。这样一些作家，在通行的几种文学史里，不但够不上列为专章，连专节有时也够不上的，因而对他们的论述，往往浮光掠影，谈到生平，多模糊不清，甚至存在着错误，比如对于李益就是如此。看新旧《唐书》文艺、文苑传，或有事功、名位通显的专传，以及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全唐诗·小传》吧，往往是语焉不详，诸多歧异。就看《唐才子传》吧，也嫌简略，又常常发生和上列几种书说法矛盾，统一不起来。那么，读他们的作品吧，即使把有问题的如一作某人的诗除开，也往往和他们的各种传记扣合不起来，疑窦很多，真伪莫辨。有些是经过前人今人研究清楚的了，比如张尔田《李义山年谱会笺》，闻一多《岑嘉州系年考证》，卞孝萱《刘禹锡年谱》（当然其中也还略有一些可议之处，但那是枝节，无碍大体），但多数这种作家却还没有。要把一部中国文学史写扎实，对这些作品数量少、但质量却很高的作家，也必须弄清楚。光是四杰、沈宋、王孟、高岑、韩孟、元白、张王、前后李杜、皮陆……恐怕是不行的。何况举到的这些作家中，也还有没搞清楚的。比如高适，就还没有搞清楚。从解放后已发表的文章看，分歧还相当大，其他的就更不用说。这当然不是一人之力——特别是写文学史的同志——所能“克奏肤功”，那有那么多的精力时间呢？！得靠大家来作。我个人对此颇有一点兴趣，读到那些名篇，欣赏着那些艺术珍品时，总想知道那位诗人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、什么情况下写的？从而，进一步了解那位诗人一生是个什么样子？了解全部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局部，于是不自量力，总想把那些问题弄清楚，也算是一种好奇心、求知欲吧！所以不顾自己的浅薄鄙陋，想把唐代那些“名位不振”，

作品也不多，但却有几首甚至一两首好作品的作家生平弄清楚。旧籍对这些诗人，又往往没有记下他的生卒年、享年，弄清他的绝对年代，无法给他作年谱，将其作品系年。只有零零碎碎，挖到一点说一点——当然，一定还有挖错了的——就仿王国维的《太史公行年考》，叫作唐诗人某某的行年考吧。实在感到有点“僭越”的意味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象王之涣的“白日依山尽”、王昌龄的“秦时明月……”、李益的“回乐烽前……”，这些诗章，影响读者，其面之广，恐怕还是不在太史公的《史记》之下。因此，心里也就坦然一些。就叫它《唐诗人行年考》吧。

考来考去，自己也感到七零八碎，远不如年谱的完整。末了，只好赘上一篇“总结”，来个“新传”什么的。力求使读者有个较完整的印象。因为“传”的是诗人嘛，又不能不对他的诗说几句，肯定大有说错了的地方。反正连同他的生平，都仅是供写文学史，或研究唐代文学的同志参考而已。如果能起到这样一点作用，那就是我的莫大荣幸了。

现在的这几篇，其实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稿。本来是十几篇，浩劫一来，你搞何益于反修防修的繁琐考证，那还了得！虽然漏网，没被抄去，自己害怕，决定悄悄全部烧掉，烧的当儿，不觉敝帚自珍，姑且留下这几篇吧，将它藏得死死的，十多年来，从未去动它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近两年，领导再三强调搞科研，不得已，才又以这个充数。翻出来一个个从头到尾加以修改、打磨、提高。即使发表过的，也有增益。就弄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，觉得这些东西也还有点意思，打算要了去印行。惶悚之余，只好将这个不成样子的东西奉呈应命。

我过去就有一个“野心勃勃”的打算：将唐代诗人，依初盛

中晚四组，各选其中有几首名作的、算二三四流的、文学史上有资格列专节的、或至少要提到的作家，各选十人左右，考其行年，撰为新传，略论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。“贤者志其大者，不贤者志其小者”，自顾很浅陋，就搞点小的吧。

这个集子有点杂拌儿，将中晚唐的三位也拉进来了。将来如果“野心”能够实现，就以四组编为四集，作个全面调整。这个小本本姑且算第一集。是以他们生年的先后排列的。如果生年相同呢？以他们在文学史上地位的高低、影响的大小分先后。高而大的当然在前，低而小的，那只有屈尊居后了。

最后得感谢徐永年同志、曹慕凡先生的再三鼓励，和西师图书馆的同志，打破常规给了我极大的方便，否则是难于弄出来的。谨此一并志谢。

谭优学

一九七九年十月

## 目 次

王 翰行年考	( 1 )
孟浩然行止考实	( 17 )
李 颀行年考	( 55 )
崔 颢年表	( 73 )
王昌龄行年考	( 90 )
高 适行年考	( 119 )
储光羲行年考	( 163 )
√李 益行年考	( 188 )
√张 祜行年考	( 239 )
√赵 嘏行年考	( 289 )



## 王翰行年考

开元诗人王翰，《全唐诗》中仅存作品十四首。但在当时，声名赫赫，故两《唐书》有传，传亦较详。其生平事迹，大体清楚。按其行辈，应算边塞派的先驱。为人豪宕不羁，常逸出礼法绳墨之外。其高自标置，尤惊世骇俗，有极为突出的鲜明个性。富于浪漫主义气质。

**唐武则天垂拱三年丁亥（六八七）** 王翰生，一岁。

两《唐书》翰本传（《旧唐书·文苑》中，《新唐书·文艺》中）俱云：“翰，字子羽。并州晋阳人。”是翰之郡望、籍贯一致，均太原。而不具翰之生、卒及享年。兹据闻一多《唐诗大系》拟翰生于是年，按其生平，尚无扞格，今从之。

翰，《旧·传》作澹。《集韵》侯吁切，音翰，同澹。但古人名字相应，王翰字子羽，应以作翰为是。作澹当是传写之误。或同声相假。

**唐中宗神龙二年丙午（七〇六）** 二十岁。

王翰二十岁以前之行年无考。

客游凉州，当此后数年间事。其名篇《凉州词》二首，亦其时之作。

《凉州词》二首，已选入芮挺章之《国秀集》，挺章序云：“自开元以来，维天宝三载，谴谪芜秽，登纳菁英，可被管絃者都为一集。”是其所取之诗，乃开元以来为人传诵之篇目，而下限为天宝三载。《凉州词》既已入选，当开元以来之“菁英”无疑。其第一首“葡萄美酒”人皆习知，兹略。其第二首云：

秦中花鸟已应阑，塞外风沙犹自寒。夜听胡笳折杨柳，教人意气（一作气尽）忆长安。

不用说，此诗人身在凉州（今甘肃武威）之证。翰究以何时客游凉州、或从军边塞，已不可考。兹臆定为自今年至二十五岁成进士之前，或不至大误。

翰成进士后，大都在原籍并州，为并州大吏张嘉贞、张说幕客。登制科后，一度为昌乐尉。此后居官或在长安，或在洛阳。开元十四年贬汝州，改仙州，又贬道州，卒。其间，游凉州之可能性似较少，不若诗人年二十余“杖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之可能性为较大。故臆定为二十五岁以前。

另一颇堪注意之事，则翰虽有大名于当时，自视亦极高，但作品未入《河岳英灵集》。其原因或系该集在年限上乃“起甲寅，终癸巳。”甲寅，开元二年也。二年以前之作，不以阑入？此或可证《凉州词》乃开元二年以前之作。则王翰凉州之游，当亦开元以前。

两《唐书》翰本传称其“少豪荡不羁”或“少豪健恃才”，此言其为人风格。翰具有如此之性格，于其游凉州而有《凉州词》之作，或不无关系。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”虽情绪略带悲凉，然基调却是高昂慷慨，并不低沉，亦诗如其人

也。

窃谓王翰之七言歌行《古长城吟》，亦系客游河西，闻见之间，有感而作。置之高、岑边塞诸作中，亦是上乘。而自来选家登录者少，世不多见。本文为证明其游踪，特全录之如下：

长安少年无远图，一生惟羨执金吾。麒麟前殿拜天子，走马西击长城胡（一作走马为君西击胡）。胡沙猎猎吹人面，汉虏相逢不相见。遥闻鞞鼓动地来，传道单于夜犹战。此时顾恩宁顾身，为君一行摧万人。壮士挥戈迴白日，单于溅血染朱轮。归来饮马长城窟，长城道旁多白骨。问之耆老何代人？云是秦王筑城卒。黄昏塞北无人烟，鬼哭啾啾声沸天。无罪见诛功不赏，孤魂流落此城边。当昔秦王按剑起，诸侯膝行不敢视。富国强兵二十年，筑怨兴徭九千里。秦王筑城何太愚，天实亡秦非北胡。一朝祸起萧墙内，渭水咸阳不复都。

就内容言，无何新义，非战之作也。诗题长城，凉州附近正有古长城遗址，而“长安少年”亦富典型意义。就通篇所写，似非身临边庭者不能道。此或亦可证王翰之凉州行也。

**景龙二年戊申（七〇八）** 二十二岁。

《龙兴观金籙建醮》诗①，当是年王翰在长安作。题下原注云：“景龙二年。”

关于龙兴观，唐韦述《两京新记》卷三②云：“次南曰崇化坊，东南隅，龙兴观。”注云：“贞观五年，太子承乾有疾，勅道士秦英祈祷，获愈，遂立此观。”《唐会要》五十：“龙兴观，

崇教坊。”徐松《唐两京城坊考》卷四：“次南崇化坊，东南隅，龙兴观。”下引注文俱略与上同。是此观在长安。又同卷《唐会要·杂记》：开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，祠部奏，诸州县行道散斋观寺。准式，以同华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、道士、女冠等，国忌日各就龙兴观行道散斋。复请改就开元观寺。勅旨，京兆河南府，宜依旧观寺为定。惟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，宜就开元观寺，余依。”可见龙兴观中经常有“行道散斋”之坛场建醮法事。此诗题“金籙建醮”，盖道家谓天帝诏书曰金籙。《唐六典》：“道士修行，斋七：一曰金籙大斋。”而诗云：“泰山巖巖兮凌紫氛，中有群仙兮乘白云。”正言天帝排场也。可见龙兴观在一切道观中，有其较特殊之地位。

又《唐两京城坊考》五，洛阳明教坊亦有龙兴观之名。惟下无注。以视长安之龙兴观，不如其赫赫有历史地位。据上引《唐会要》，各府州县郭下，似均有龙兴观或龙兴寺（仿如后世之城隍庙），然观王翰此诗及上引诸书所纪，又注明景龙二年，观名前未标州府县名，似以指长安之龙兴观为宜。故是年王翰当在长安，往龙兴观看此热闹法事坛场，作诗。意其谒来河西，必经长安也。故《凉州词》有“教人意气忆长安”之语。

唐睿宗景云二年辛亥（七一一） 二十五岁。

进士及第。

《唐才子传》云：“景云元年，卢逸下进士及第。”按景云改元于七月，所谓元年者，盖二年之榜也。因为《登科记考》云：“唐人例以上年冬命次年知举之人。故王翰实二年榜也。”元年知贡举者为武平一，二年始为卢逸，故王翰实系本年进士。

两《唐书》翰本传云，“登进士第，日以蒲（博、纵）酒为

事。”可以想见翰本恃才傲物，豪健狂荡，“析多名马，家蓄伎乐”（《唐才子传》），豪华阔绰，根本不在乎那点官俸收入。所以成了进士，并没有求仕进，反而借此机会，“捅了马蜂窝”（详后）。于是意气更增，纵博饮酒，宾从盈庭。

### 唐玄宗开元元年癸丑（七一三） 二十七岁。

在长安。否定吏部铨曹所铨叙注拟之等第。以九等自定海内文士，列张说、李邕与己并居第一，窃榜于吏部东街，轰动一时，观者万计，莫不切齿。真所谓犹今言“捅了马蜂窝”也。后被查获，几遭刑宪。

唐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三《铨曹》云：“开元初，宋璟为（吏部）尚书，李义、卢从愿为侍郎，大革前弊，据阙留人，纪纲复振。时选人王翰，颇工篇赋，而迹浮伪，乃窃定海内文士百有余人，分作九等，高自标置，与张说、李邕并居第一。自余皆被排斥，凌晨于吏部东街张之，甚于长名。观者万计，莫不切齿。从愿潜查获，欲奏处刑宪，为势门保持乃止。”《旧唐书》九六《宋璟传》：“睿宗践祚，迁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先是，外戚及诸公主干预朝政，请托滋甚。崔湜、郑愔，相次典选，为权门所制，九流失叙，预用两年员阙注拟，不足，更置比冬选人，大为士庶所叹。”象这样乌七八糟的铨选工作，为何不可加以否定而攻击之？！不过别人不敢作，只有豪荡狂放、恃才傲物的王翰，有勇气甘冒刑宪去作了，骇人心目，震动了整个长安城，应该说是大快人心事。《宋璟传》继云：“至是，璟与侍郎李义、卢从愿等大革前弊，取捨平允，铨综有叙。”看来王翰的这一冲击是起了作用的。

按《新唐书·宰相表》，宋璟以睿宗景云元年七月丁巳，自洛

州长史检校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以次年二月甲申，贬为楚州刺史。其在吏部，计八阅月。《旧唐书》卷一百《卢从愿传》：“睿宗践祚，拜吏部侍郎。中宗之后，选司颇失纲纪，从愿精心条理，大称平允。其有冒名伪选及虚增功状之类，皆能撻发其事。典选六年，前后无及之者。”同书一〇一《李义传》：“景云元年，迁吏部侍郎，与宋璟、卢从愿同时典选，铨叙平允，甚为当时所称。”开元元年，宋璟虽已不在吏部，但大革铨选积弊，乃自璟发之，从愿、李义承袭不替。故《闻见记》云：“开元初”与《宋璟传》云“景云间”，虽不合，但细究之，并不矛盾，当以《闻见记》为是。即此事在开元元年。且景云二年，王翰已成进士，乃于开元元年，实即第二年，预于铨选授职之列。翰有鉴于以往铨曹之积弊太深，故有此勇敢之冲击，罔顾一己安危荣辱。

王翰既然“捅了马蜂窝”，自然不会被铨叙授官。故诸书无翰成进士后入仕记载。当以此也。

按《新唐书·张说传》：“永昌中，武后策贤良方正，诏吏部尚书李景谥糊名较覆，说所对第一。”本年说为中书令。《旧唐书·文苑·李邕传》：“邕少知名，长安初，内史李峤及监察御史张廷珪，并荐邕词高行直，堪为净谏之官。”本年，邕当官左台殿中侍御史，或户部员外郎。张李二人，当时无论道德文章及其正直声誉，均极著人望。翰引之与己并列为一等，余均被排斥居下，其刚直自负如此，被排斥者宜其切齿痛恨。然此青年诗人锋芒毕露，固已骇人耳目矣。

封建的铨选制度，是很难保持其长期清廉平允的。试观《旧唐书》从愿传：“开元四年，上尽召新授县令，一时于殿廷策试，考入下第者，一切放归学问。从愿注拟非才，左迁豫州刺史。”

受賂与否，就很难说。至少开元三四年以后，从愿之典选，即不如初期之廉洁公正，盖可断言。故其本传后云：“从愿广占良田，至有百余顷。其后上尝择堪为宰相者，或荐从愿，上曰：从愿广占田园，是不廉也。遂止不用。”故王翰之攻击，貌似“捣乱”，实则极有道理。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铨选制度，补偏救弊于一时也，亦可。

**开元二年甲寅（七一四）** 二十八岁。

在长安。举直言极谏，又举超拔群类科。调昌乐尉，当在今年。

《新唐书》翰本传云：“复举直言极谏，调昌乐尉。又举超拔群类。”以两科之举分属两次，中间为昌乐尉。《登科记考》考为本年两科并举，而以手笔俊拔科即超拔群类科。甚是。《全唐文》三五五有王翰《对两贯判》，略云：“……甲无一德，遂编两贯。礼不忘本，延州密迩本京毂，武以戒严；鄜府远邻于河县，详其动静。徇欲滋深违之则，苦从之则乐，国有大事，在戎为急；邦之荣怀，阜人斯可。益其远也，不亦宜乎”云云。同书三七三庾光先亦有《对两贯判》，题目均为：“甲先有两贯，一延州，一属鄜州为定。甲诉云：先属延州。”此当系其预试手笔俊拔科之试帖判词。题目相同，则庾可补入本年制科举下。

翰既成进士，又两中制科，其调昌乐尉，当即今年制举及第之后。

《元和郡县志》：“河北道、魏州、昌乐县。”县在今河南南乐县境。

**开元五年丁巳（七一七）** 三十一岁。

至迟是年前，已解昌乐县尉。在原籍并州。并州长史张嘉贞、大都督张说，咸加礼敬。

《旧唐书》翰本传：“进士登第，日以蒲酒为事。并州长史张嘉贞奇其才，礼接甚厚。瀚感之，撰乐词（今佚）以叙情，于席上自唱自舞，神气豪迈。”《新·传》云：“翰自歌，以舞属嘉贞，神气轩举自如。”幕客要府主一同跳舞，非高自标置如翰者不能也。《旧·传》又云：“张说镇并州，礼瀚益至。”《新唐书》本传同。说之于翰，或有曾被推服的知己之感。故其后于翰颇加提挈。前所云“势门保持（王翰）”，疑亦指说也。况说本传云：“喜延纳后进，善用人之长。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王化。”其礼瀚益至，就更在情理之中。

按《新唐书·方镇表》：“北都长史领持节和戎大武等诸军州节度使，”始于景云二年。检吴廷燮《唐方镇年表》，张嘉贞之为并州（即“北都”、“河东节度”），自开元四年八月至八年正月。张说继之至十年。则此数年间，翰当已解昌乐尉，在原籍并州二张幕中作客。而豪放倜傥，于二张若按平辈，颜色不为降屈。这确实可算一种宝贵的品德。

张嘉贞后入朝为相。《旧唐书》九十九、《新唐书》一二七有传。张说则更为显赫。

开元十年壬戌（七二二） 三十六岁。

在并州。曾随张说往东都。《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》诗即今年作。

《旧唐书》九十七《张说传》：“其（开元九）年拜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明年，又勅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，往巡五城，处置兵马。”为此，玄宗有《送张说巡边》诗，以宠其行。



一时大寮奉和甚多。翰时客说幕中，故有是作。以上年说已为尚书，故称张尚书。

翰诗有“不惮炎蒸苦”、“王城日半斜”、“骑历河南树，旌摇塞北沙”等语。按《旧·纪》，玄宗于“是年春正月丁巳，幸东都。”“闰五月壬申，兵部尚书张说往巡朔边。”时令正合。盖说巡边之前，当奉诏赴东都，意翰亦随之前往。闰五月乃自洛阳首途。故玄宗诗有“旌轩溢洛阳”之语。

开元十一年癸亥（七二三） 三十七岁。

四月，至长安。官秘书省正字。

《旧唐书》瀚本传：“张说镇并州，礼瀚益至。会说复知政事，以瀚为秘书正字，擢拜通事舍人，迁驾部员外郎。”

按《新唐书·宰相表》，“开元十一年四月甲子，说为中书令。”云“复知政事”者，盖说先曾于景云二年，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知政事。至此故曰“复”。翰之官秘书正字，以张说入相拔擢故。说之入相，既在今年四月，则翰之入官正字，即当是年四月或其后不久。

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，“秘书正字，正第九品下阶。”一般县尉，从第九品上下阶。虽品秩无何升迁，然已由外而内，盖唐世重内职轻外任也。况复朝有奥援，惟兹稍渐磐陆，指日青云可待。

开元十二年甲子（七二四） 三十八岁。

在长安。仍官秘书正字。

翰入官，初为秘书正字，转官为通事舍人。按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，通事舍人系“从第六品上阶。”即系太子通事舍人之省